

炎黄学的发轫之作

——读周洪宇、王文虎《炎黄学导论》

◇ 赵 婧

何为“炎黄学”？周洪宇、王文虎两位学者在新著《炎黄学导论》中认为，炎黄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学、统领之学、国家之学；是以一定的范式对炎黄文化进行系统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学问之学。炎黄学的研究对象是炎黄、炎黄精神与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质点，三个圈层”；是以历史（祖）与逻辑（道）、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理论与实际的三统一为原则而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是从“学”的高度对炎黄文化进行梳理的学术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一门既传统又现代的“学问”，炎黄学具有原发性、本土性、根本性、跨学科性、综合性的特点。因此，二位学者的著述是在多维视角的观照与思考下，遵循着祖与道合一、文明与国家合一、问题研究与体系构建合一的原则，运用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哲学与宗教学结合、一般概述与特殊分析结合的方法。

全书共有十章，前六章以历史学为基础，吸收神话传说、姓氏之学、考古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了以炎黄为主体的三代以前的原始文化，是为狭义炎黄学，亦称“祖论”；后四章的内容综合了王制考、道统考以及经学考的内容，揭示了炎黄文化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是为深义炎黄学，可称为“道论”。在“祖论”与“道论”的结合下，全书构建出“炎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亦涵盖了历史学、文化学、训诂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等方面的内容，如此融合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的学问之学，有“炎黄学”的发轫与奠基之功。该书突出了研究的综合性，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观照与思考。

场域视角的观照与思考

场域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指的是一种

文化或者思想所产生的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炎黄学产生的场域较为复杂，《炎黄学导论》一书在分析论述炎黄学的产生与发展时，主要从自然地理场域、国家场域、文化场域观照与思考。

首先是自然地理场域。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是以陆地文明为主的国家，炎黄文化则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炎黄学导论》的首章，运用“文献炎黄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别具一格的炎黄文化场域论：“炎黄文化既有大陆文化性格，也有海洋文化性格。”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正是炎黄文化产生根植于地理环境的中国特殊社会形态”的观点。

其次是国家场域。在第六章“考古层面中华文明的早期根源与发展”中，两位学者运用“考古炎黄学”的成果加以论述。书中借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国家的起源公式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理论，并作出了他们自己的推断与论述：炎黄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古文化到古国的过程，其实就是炎黄文化的形成过程。书中颇有创见，认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古文化，在《山海经》中得到了保存。

最后是文化场域。作者认为，从古国到方国的考古学解读中，可以认定良渚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与红山文化相比较，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更高，其国家形式可能处于由古国向方国的突破阶段，并实现了从血缘到地域的跨越；陶寺文化的形成体现了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原陶寺文化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序幕，是中华文明礼乐典章制度的肇始者；二里头文化与陶寺文化一样，都是崇拜龙图腾的族群。二里头遗址已经有都邑、青铜和文字等文明特征，继承了陶寺的礼乐文化，同时兼

具大汶口、良渚等文化因素。

民族融合中的动态考察

中华民族是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炎黄裔胄,那么炎帝与黄帝究竟是真实人物还是神话传说?究竟是单独个人还是部落民族?与蚩尤等又有何关系?解读这些问题,必须从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视角来观照与探讨。

首先,《炎黄学导论》认为,炎帝与黄帝作为个体,他们即使是同时代的,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精神象征。炎帝是植五谷的农耕文化的象征,黄帝则是垂衣裳而治天下的礼制文明的象征,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最初质点。

其次,“三皇五帝”或非真正意义上的帝王,可能是部落首领,因部落实力强大而被推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炎帝神农氏这一文化英雄,其实是多个传说中古史人物的复合体。黄帝是我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又一位文化英雄,被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而在文化史的话语结构中,黄帝有三个维度即“神话黄帝”“仙话黄帝”“史话黄帝”。

最后,考察关于炎裔、黄裔以及炎黄部落的形成过程。认为谈炎裔,以蚩尤为主要代表;论黄裔,以黄帝及其继承者所创造的五帝时代为对象。炎帝神农氏是“农祖”,黄帝轩辕氏为“政祖”,蚩尤为“兵祖”。黄帝及其后裔可以称之为五帝时代,这是中国文化在其前轴心时期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书中从民族融合的视角,动态地考察炎黄文化,对于深化我国民族团结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视角的多面呈现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优秀的中华文化又哺育了中华民族。李瑞环同志曾在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周谷城先生也说:“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热爱劳动、爱国敬业等精神,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炎黄学导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观照与思考炎黄文化精神。

(一)炎黄与姓氏文化。姓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姓氏之学”,将中华民族的初祖追溯到炎与黄。书中认为:姓,起源于母系社会,是族号,在其中人人都有归属于族号的权利,因而姓意味着人皆生而平等;氏,起源于父系社会,是姓的分支。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从“古文化”(姓)到“古国”(氏)的演化过程。因此姓氏之学构成炎黄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可以称之为谱系炎黄学。宗法制度以及宗法社会是姓氏的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

(二)炎黄文化与语言、艺术、科学。《炎黄学导论》认为,炎黄文化是以象形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作为“物象之本”的刻画符号是中华语言文字的源头。中华语言文字出现了多次的分叉发展,第一次是“雅言”和“夷言”的分叉;第二次是八卦符号与表意符号、官话与方言的分叉;第三次是书写与书法的分叉。艺术是文化的重要呈现形式之一,《炎黄学导论》选取造型艺术来研究对炎黄精神的表现,提出炎黄文化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形象表达。而炎黄科学论是以人为目的的“物类相感”系统论,虽然不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不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却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

(三)炎黄文化与神话、宗教、哲学。通过中国神话,看到了重视劳动的炎黄精神;通过中国宗教,看到了以祖为本和以祖配天的炎黄精神;通过中国哲学,看到了以民为本的炎黄精神。

炎黄精神的深度解读

炎黄精神是以炎黄为主体的精神现象。二位学者在《炎黄精神论》中已经对炎黄精神进行了阐释。在《炎黄学导论》中,又进一步发展了之前的理论,借

用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概念,将炎黄精神的分期更新为前轴心时期、轴心时期、后轴心时期、新轴心时期。

炎黄精神的主体是部落、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的代表者。炎黄学讨论的炎黄精神,从狭义讲,应该是指文明形态的中华文化。作者独创了炎黄精神的圈层论,认为炎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圆心,由“三皇”“五帝”“三代”构成,炎黄则是这个圆心的最初“质点”。

中华文明的几大圈层,第一个文化圈层是诸子之学,将“宗庙社稷”这个最初质点转化为儒道互补的子学思维,将关注的重点由天帝转化到了人间,这是周人思想的升华。第二个圈层是从汉学到宋学的思想体系。从战国晚期至汉初“黄老道德之术”,深层机理是炎黄合一;再至汉代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始儒家由诸子的一家之言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即变成了对权力进行诠释的经学;魏晋贵无玄学,是对经学的一次否定,于离经叛道中表达玄学对淳朴人性的向往。这一时期,黄帝精神被压抑了,而炎帝神农的淳朴人性则得到高扬。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将表达黄帝精神的儒学与表达炎帝精神的道学统一了起来,在这个统一中又融入了佛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哲学思想的昂扬时代,形成了系统开发哲学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功能的思潮。第三个圈层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时期。曾经炎黄文化遭到蔑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确立了民族主权、国家主权、人民主权,在当今世

界格局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就全球治理表达了“中国立场”。

如果说西方表达自己的立场是面对耶稣,而“中国立场”的表达面对的则是炎黄。以炎黄精神这个“最初质点”出发,中华文化圈层的半径越来越长,表现出了这样一条脉络:炎黄—“皇天上帝社稷”—宗庙社稷—儒家道家—夏(儒家道家)+夷(佛、伊斯兰教)—中学(儒道佛)+西学—中华民族新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条脉络,用鲁迅的话讲,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体现了炎黄精神的本质和规律。炎黄学所把握的这条发展脉络清楚地显示出炎黄之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学、统领之学和国家之学。

总之,《炎黄学导论》的出版发行是继《炎黄国祭论》《炎黄精神论》两部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创新性力作。“炎黄三论”是两位作者在对炎黄历史与文化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炎黄学在理论上的创造性构建,标志着炎黄学的完整理论体系基本形成。该书将炎黄精神、炎黄文化上升为炎黄学,明确了炎黄学的学术定位、研究对象与建构原则。全书兼具智慧与美感,体现出精深内容与宏阔结构相统一、哲学思辨与美学表达相统一、思旧怀古与开拓创新相统一的特点,不失为一部炎黄学的发轫与奠基之作。

作者简介:赵婧,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炎黄春秋》2024年第6期)